非虚构文学成立的条件及其意义

陈文斌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关键词: 非虚构;符号学;叙述策略;文本形式

摘要: “非虚构”研究热潮引起的争论远多于共识,对作者意图与实践的强调远多于对文本形式的剖析,概念使用的意义边界也存在重叠与矛盾。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产物,非虚构文学又卷入了真实与虚构辨析的诗学传统,其形式特征与文本内容又牵扯出作者、读者与文化的复杂关联。本文认为,非虚构文学的成立有赖于四个层面的共同作用:文本内,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一;伴随文本,副文本与型文本的合拍;从文本到文化,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语境元语言的合力;文本外,作者与读者的合谋。由此,“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化形式,需要首先回到文本形式特征的辨析,进而才能明晰文本之外的主体与文化如何发挥作用。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3)-009-08

DOI:10.13399/j.cnki.zgwxj.2023.04.002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fiction Liter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CHEN Wen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1731)

Key words: non-fiction; semiotics; narrative strategy; text form

Abstract: The upsurge of “non-fiction” research has caused more controversy than consensus. The emphasis on the author’s intention and practice is much more tha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form. The meaning boundary of its concept use also exists overlap and contradiction. As the product of non-fiction writing, non-fiction literature is involved in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ruth and fiction, and its formal features and text content involv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 reader and cult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fiction depends on the joint action of four levels: the unity of author and narrator within the text; cooperation between para-text and archi-text; from text to culture, text carries meta-language and context meta-language together; outside the text,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Therefore, as a cultural form, “non-fiction” needs to return to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 so that the role of the subject and culture outside the text can be clarified.

说清什么是纪实,也就确定了什么是虚构。将作品称作“非虚构”本身就有点让步命题的味道:形式上像是虚构,又非虚构。这个范畴可能存在,但是首先要弄清虚构和纪实的分界,才能讨论这个或许存在的中间地带。

“非虚构”作为一个确定概念,其意义指向却是不确定的。“非虚构”既可以是一个理论辨析问题,也可以成为具体的创作实践问题,但这两者往往交叠在一起,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从概念本身来说,“non-fiction”(被译为“非虚构”)原意是“非小说”,在欧美作为一种书目分类方法,目的是与“fiction”(小

[收稿日期] 2023-0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20&ZD04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真实’意义的符号美学研究”(Y030232059002035)

[作者简介] 陈文斌,文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说)相区别。《人民文学》推动了这一概念的流行,李敬泽当初刊发韩石山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时的初衷是:“像韩这样的作品,当然不是小说,是报告文学吗?是散文吗?都不很对;中药柜子抽屉不够用了……最后,就叫‘非虚构’吧,看上去是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1]这一意义指向的模糊,也喻示着其后有关“非虚构”的研究有着足够的争辩空间。

将难以言说之物推入不可言说之中,这是当下中国学界有关“非虚构”讨论的普遍困境。论及“非虚构”,必然触及事实、真实、虚构、虚假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内容层与形式层的混淆往往掺杂其中,文本内与文本外的区隔也模糊不清。由此,单问题牵连出复杂的问题域,多种阐释相互矛盾反而无法导向共识。归纳来看,有关“非虚构”问题的阐释大致有三种角度:

第一种是将问题留给作者。作者的意图是文本是否虚构的关键,即文本是否建基于更多主观的真实感,并从作者意图出发,判定“非虚构叙述在进行事实上的主观叙述时尽可能谋求最大程度上的客观性,即所谓真实感”^{[2](P50)}。这里的真实感,既指向事实层面的真实性,也指向创作层面的求真意图。

第二种是把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判断。所谓程度模糊论,即承认真实与虚构存在边界,又否定两者绝对分割,因此只能将所有叙述都纳入相对判别之中。这种模糊一方面是由于读者个体的主观感受存在差异,作品会“被一些人读作‘事实’,而被另一些人读作‘虚构’”^{[3](P2)};另一方面又受到历史变迁带来的文化社群观念变化影响,“虚构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着的”^{[4](P63)}。神话被原始部落视为真实,而如今被当作虚构,即是此理。

第三种是指向文本叙述形式。所谓虚构泛化论,即将一切叙述都归为虚构,解构真实本身的确定性。“任何写作一个叙事的人都是在进行虚构。”^{[5](P33)}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浪潮,这种消解真实的途径将非虚构文学视为虚构的变体:“文学的根本在于通过虚构顶替了真实,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文学文本,从根本上来讲都是虚构的。”^{[6](P89)}此处的虚构,指的是叙述作为符号再现的手段,必然与事实隔了一层,由此,原初的真实已经离场,虚构成为本质。虚构的概念被泛化并不断扩张,不仅确凿了叙述行为的虚构性,还判定“一切意义都是虚构的……断言‘生活’与‘现实’本身都是虚构”^{[7](P151)}。如此,一切皆虚构,非虚构作为表象,其本质仍旧是虚构。

这三种论调都有其合理性,而引起争议的问题源头,一方面是形式论与内容论的矛盾与犹疑,另一方面是真实与事实、真实与真实感、虚构与虚假等概念的模糊与混淆。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廓清“非虚构”研究热潮背后的理论困境,进而指认“非虚构文学”的文化形式特征。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需要区分形式问题与内容问题的论域,由此捋清对象文本与创作主体的关联;另一方面需要将作者、叙述者、文本形式、读者、文化语境统合考量,由此将创作实践置于理论视域中进行辨析。

一、非虚构的漩涡

首先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小说三者的混用。显而易见,小说作为现代文学观念中的一类体裁,基于其形式共性确立了自己的“类”。从魏晋时期的四类八体,到韵文、散文的二分法,再到如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四分法,文体划分本就是基于形式的同异展开。由此,非虚构小说是将非虚构文学限定在小说这一体裁中,而诗歌、散文、戏剧的非虚构性则较少被关注。中国有着悠久的纪实文学传统,其形式特征就是“非虚构”,《史记》被国外学者视为非虚构文学经典^{[8](P60)},恰恰是因为其文学性与史实性的融合,“非虚构”的形式特征才确立了历史、民族志、回忆录、日记、传记等文体的风格属性。文学可以非虚构,正在于其对“非虚构”这一形式特征的模仿、靠拢与征用。从边界范围来看,非虚构写作大于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大于非虚构小说。

非虚构文学囊括了不同文学类型,并与新闻、田野调查等文体一同纳入非虚构写作的范畴内。写作是创作主体以文字符号再现对象的过程,文学、历史、新闻等都是写作成果的类型归纳,小说只是文学的一个子类,总结来看,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小说呈现出前者包含后者的圈层关系。要理清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小说的诸多争议,首先需要解释清楚“非虚构”的形式特征,然后才能明晰“非虚构写

作”的判定标准。也唯有如此,才能理清非虚构文学相关论争的局面。

非虚构写作不只是一种主观态度。洪治纲认为,非虚构写作“以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直面现实或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等叙事特征,折射了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9](P62)}。这一观点显然是把“非虚构”视为一种以主体态度为导向的创作方式,而这一判定显然无法处理历史、新闻等更为复杂的非虚构写作,因为创作主体无法亲历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而只能以离场的方式去回溯并重现事实。

很显然,非虚构写作并不只是一种写作姿态,且写作姿态早已在文本之外。回到非虚构写作的文本自身,“非虚构”必然是一个形式问题。所谓的在场性、亲历性都是叙述形式呈现出的效果,是作者意图的符号再现。同时,形式与内容本不可分割,“内容是个别性,是信息表达中特殊的東西;形式是共同性,是文本与其他文本可以合起来讨论的东西”^[10]。当我们在说非虚构文本时,是将“非虚构”作为一个有边界的形式共性来讨论,如果陷入对作者意图的真假判定,那“非虚构”就变得不可言说了。

当下对于非虚构写作的讨论总是习惯于陷入内容的非虚构性中,而内容非虚构性,又与创作主体对于描写对象的亲历或考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亲历抑或考证,呈现在文本中都是一种叙述策略。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能与虚构写作区别开来,正是在于其建构了纪实型叙述的文本特征与文化属性。本文不否认非虚构写作者对真相的尊重与追求,但就学理分析来看,聚焦作者及其意图、关注作者是否亲历与在场,根本无法全面解释“非虚构”的概念内涵。

新闻与历史被视为“非虚构”,并不是说新闻与历史就等于真实。新闻也可以有假新闻,历史也会加入野史传言。约旦的权威媒体《阿拉伯独立日报》于2010年4月1日在头版刊发外星人侵入地球的新闻,由此导致全城恐慌。这一假新闻被接受为真,其实可以导出两个论点:一者,新闻会报道假内容,新闻并不直接与事实等同;二者,新闻被接受为真实,是基于体裁特征与接受程式。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发送者意图并不决定文本真实与否的判定,文本类型决定了接受程式,接受程式关乎文化规约。我们判定新闻可信在于其是纪实型叙述,野史不可信则是文本类型限定的结果。事实上,正史也并不一定完全真实,《左传》有宫闱秘事,《史记》刻画鸿门宴细节,如此种种都可以是虚构,但它们被接受为真实恰恰是体裁压力下的文化接受程式要求。时光已逝,对象离场,“就历史的还原工作而言,要得出绝对准确和真实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今人所看到的历史,永远都只是过去史实的真实景象的部分缩影”^{[11](P8)}。符号再现本身也就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断趋近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

文本形式特征与读者接受程式,这两者是本文着力分析的点。之所以避开创作者主观意图,恰恰是因为作者意图不可预测,“没有哪种客观的标准能够检验任何一种意图是否可靠”^{[12](P46)},甚至于写作者的意图也是被叙述出来的。而谈论读者接受程式,也并不是说要征求每一位读者的意见,而是要从阐释社群的立场去看特定文本形式的接受模式。文本形式影响了阐释方式,这里面仍旧有作者的主体性在。正是作者的叙述建构了特定的形式,并引导读者去按照相应的阐释要求去看待和理解作品。总结来看,作者的非虚构写作意图经由叙述形式构建了非虚构内容,读者在非虚构文本的形式“压力”下把握到真实感,如此,整个的意义生产、固定、传播与接受过程得以形成。

不论是非虚构的发送意图,还是非虚构的接受感觉,都立足于真实性之上。由此,我们需要进入对真实、真实性、真实感以及事实的概念辨析中。事实是既定的,客观存在且历时流动。对于事实的符号再现,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真实与虚假是一种价值判定。虚构是叙述策略,既立足事实又加入了想象等人工改造的痕迹。真实性是文本的符号品质,真实感是对对象的主观感受。理清这些概念我们就能探究一些观念分歧的根源。梁鸿认为:“只要是‘人’看到的,只要是‘人’试图去叙述它,都难免带着‘叙事人’的偏见、经验、知识和立场。”^{[13](P51)}虚构作为一种叙述策略难以避免,因此,非虚构写作并不排斥虚构的加入。冯骥才认为,自己的非虚构文学“不是虚构的。人物、事件、内容、细节、那里边每一句话都是口述对象说的,都是真实的”^{[14](P46)}。这是在说符号再现与事实之间的真实对应关系,一切的转述都是基于事实,因此排斥虚假。同为非虚构写作者,这里面的矛盾点在于虚构作为叙述策略能够发挥

多大作用。前者认为虚构不可避免,后者认为非虚构文学就不应该虚构。

这两种观点其实就是虚构泛化论和程度差异论的变体。虚构泛化论将叙述本身视为一种虚构策略,程度差异论的理论前提就是虚构与非虚构在争夺领地。解释两者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叙述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即叙述策略与价值判定的关系。任何的写作产出,其结果作为一个固定文本都是对事实的再现,它可以尽可能还原真实,也可以主观改造,“事件真实不等于再现真实;任何虚构都‘有关真实’,有‘真实根据’不过是加强真实感的一种叙述策略”^{[15](P185)}。符号文本与原初对象本身就是脱离的,任何的口述一旦转化为文字,也就是一种符号再现。真实性是一种符号品质,而符号的本质(即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决定了事实的离场。由此,非虚构写作对真实性的诉求,对虚构叙述的运用,对虚假价值的否定,在逻辑上并不相悖,反而可以经由叙述这一符号再现形式的学理辨析得到廓清。

二、叙述“非虚构”

虚构或非虚构,都是特定叙述类型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被接受的结果。这并不是要把非虚构的判定完全交由读者,而是要辨析清楚:“非虚构”如何构建文本自身的形式特征,并引发阐释社群对其的非虚构意义判定。虽然这里面卷入了作者的发送意图与读者的接受意义,但中心环节始终离不开对非虚构文本形式的聚焦和剖析。

需要承认的是,非虚构文学属于纪实文学的范畴,由此与虚构文学区别开来。赵毅衡对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有过辨析:“纪实型叙述,并不是对事实的叙述:无法要求叙述的必定是‘事实’(fact),只能要求叙述的内容‘有关事实’(about facts);反过来,虚构型叙述,讲述则‘无关事实’,说出来的却不一定不是事实。”^{[16](P65)}换言之,我们无法在事实与文本的对照中判定叙述的真实与否,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都与事实相关,只是各自建构真实感的形式不同。

回到形式特征,本文想要指出的是,非虚构文学是被叙述出来的。当然,任何文本都是被叙述出来的,只是非虚构的成立是基于特定的叙述策略建构。这样的判定可能会被误解为文本中心论,即以文本形式为判定标准,而搁置作者意图与读者感受。事实上,作者的实地考察、记录转述、亲历回忆等作为事实,无法直接通过文字文本去确证,陷入对作者行动的考察,反而会把文学问题变得不可言说。作者要自证清白,读者要确证真伪,这已经越出了对非虚构文本的判定。至于非虚构写作中的造假问题,则需要诉诸文本之外的事实考证。虚构与真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统摄文本风格,也无法根据作者的主观意图来判定,意图只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在叙述形式上将自己实践所获取的事实转化为真实再现,从而建构真实感。

作者还原事实的意图是非虚构写作的底线要求,而不是判定是否非虚构的绝对标准。冯骥才认为:“小说创作的思维是自由的,它完全不受制约,因为它是虚构的。非虚构就不同了。它受制于生活的事实,它不能天马行空地自由想象,不能对生活改变与随意添加,必须遵循‘诚实写作’的原则。”^{[14](P46)}这里涉及的是想象的边界问题,非虚构写作相较于虚构写作所受到的叙述限制,恰恰是一种形式上的压力,一旦暴露出虚构痕迹,真实性就会被不断削减,程度差异论在这里继续发挥作用,但程度的甄别始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谓“局部性的虚构处理,是所有叙事都绕不过的,也不会对非虚构的整体构成挑战”^{[17](P3)},其实也就是一种程度调和论,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问题。事实上,一个局部的变更就可以扭转“非虚构”与否的文本品质,叙述者“我”只需要一句话否定与作者“我”之间的关系,整个文本的真实性也就消解了。反之亦然,“非虚构”的成立恰恰仰赖于无处不在的局部标识。

非虚构文学的最终成品就是一个符号文本,“非虚构”则是其符号品质。这一品质的建构立足于文本内的叙述形式,同时卷入了一系列的符号运作策略,最终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确认。非虚构写作者的创作意图需要借助这些形式去呈现,读者对非虚构文本的认定也受制于文化语境中阐释社群的接受程式。由此,本文将从四个层面去讨论非虚构文学的文化形式。

1. 文本内部: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一

从叙述形式来看,“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一个特殊人物……作者是叙述信息的发出者,是整个叙述行为的总出发点”^{[18](P10)}。这意味着,叙述者与作者本不在同一个世界,即叙述者在文本内,作者在文本外,非虚构文学的两者合一叙述策略打破了文本区隔的框架,由此,文本内的真实要对实在世界负责,叙述文本的总体品质被确立。反之,站在虚构写作的立场上,文本中的叙述者并不等于作者,它只是作者建构的声音源或讲故事的人,文本内可以建构各种真实,但无需对实在世界负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真的爱上了林黛玉,这种情感是真实存在的,但读者无法要求历史上真的存在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是因为叙述区隔了文本与现实,“红学”的各种考证只能从隐喻意义上对接历史,而无法从本质上动摇《红楼梦》是虚构型叙述的认识。

非虚构文学的风格确立,首先需要立足于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一。叙述者“我”如何与作者合一是叙述形式的问题。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选择酒店小伙计“我”作为叙述者,“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19](P457)}。这一身份交代很有回忆录的质感,但该文本仍旧属于虚构型叙述。“小说首先要叙述的,是叙述者。”^{[18](P8)}作者没有将自己与叙述者等同,即可做虚构处理,这是底线要求。需要澄清的是,这一判定所要处理的是非虚构文本成立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判定事实层面的真假问题。后者难以言说清楚,正如刑侦破案或考古校勘始终需要实在证据支撑,新的证据加入仍旧会影响事实判定,非虚构文学的讨论不应陷入无尽的追索中。

回到文本风格,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一非虚构文本制造真实感的底线要求。作为叙述策略,小说也可以如此制造真实感,如马原在《虚构》开篇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20](P1)}。这一叙述策略强力自指,叙述者与作者本人同名,凸显了叙述的真实感,但紧接着叙述者用“我写小说”确定文本类型,消解了真实性。第一人称小说往往将叙述者与作者区分开来,由此避开追溯真实的可能,从而呈现出虚构面貌。马原将小说名定为《虚构》并在文本内自指“小说”,实际上确证了虚构写作要刻意避开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框架限定与文化规约。《虚构》假装非虚构,刻意暴露虚构痕迹的目的则是为了凸显虚构,换言之,作者自认这就是小说,叙述者即使叫马原,也不等于作者马原,文章就是虚构的。

2. 伴随文本:副文本与型文本的合拍

非虚构文学的类型确立需要文本自身逻辑自洽,避免描述对象有悖常识,时间与空间的锚定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契合阐释社群对于事实的共识。非虚构文学可以分为现实非虚构与历史非虚构,这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立足主体见闻记叙真实,后者回溯历史重现真实。两者各自倚重的材料也有差别:前者基于作者与叙述者合一,为文本真实性做担保;后者基于已确定的纪实型文献巩固文本风格。从共性来看,两者都在寻求文本之外的真实意义依靠,即除了文本内的合一叙述,还需要依托文本的附加因素生成真实性。

副文本与型文本是伴随文本,“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且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在相当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21](P139)}。在赵毅衡看来,副文本(para-text)是文本的“框架因素”,包括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出版文本等。非虚构文学通过副文本来标示其类型,指引解释方式:有直接用标题确证文本叙述框架的,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等,这些形式能够彰显作者亲历或口述记录的真实性。有用腰封锚定文本类型的,如阿来《瞻对》腰封写的是“一段坎坷的民族融合史,一个传奇部落的前世今生,继《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藏地史诗”;又如乔叶《拆楼记》的腰封是“首部非虚构长篇力作……本故事纯属非虚构”,以史诗定位或直言非虚构都是一种文本类型的自指。有在序言或前言亮明非虚构写作意图,如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写道:“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传”^[22],其后借助《穰县县志·概述》确证了地点的实存,以立传为意图确定文本意图;又如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在前言中不断标注材料

出处与话语源头,表明自己作为记录者的身份,同时也写道:“我的日记本中保留了他们的姓名。也许,有朝一日,我的主人公们希望别人了解他们:谢尔盖·阿米尔哈尼扬,大尉……瓦列京娜·雅科夫列娃,准尉,机要科科长”^{[23](P15-18)},如此开列几百人的真实姓名,强化了文本记录材料的真实性。

这些副文本的显现影响了文本被接受的方式,读者无法搁置副文本的指引作用,一旦刨除副文本,文本自身的非虚构性也会动摇。这些副文本指明了型文本的归属,“型文本(archi-text)也是文本显性框架因素的一部分,它指明文本所从属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21](P142)},由此要求阐释社群中的成员用约定好的接受程式来阅读。这里看起来是循环论证,非虚构文本自指非虚构类型并要求读者做非虚构解释,由此判定该文本属于非虚构的型文本。事实上,这里的自指就是叙述策略在起作用。杨潇的《重走》以“背着沉重的大包,我从地铁站出来,往一公里外的酒店走去”开场^{[24](P13)},叙述者“我”的意义指向其实并不明确,可以视为虚构,但读者仍旧确信其真。这是因为,该书的副标题是“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同时叙述者借助各种信件、回忆录、新闻报道等纪实型文献来重现西南联大的迁徙历史,借助确定的纪实型文本来指其非虚构性。现实非虚构与历史非虚构在此合拢,作者自指与文本自证同时发挥作用,副文本的意义指向锚定了型文本的集群归属,最终促成了该文本被归为非虚构文学。

对于符号文本的解释,需要确认文本、接受者、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文本形成于特定文化之中,其叙述形式是文化表意方式的呈现;接受者的认知模式也形成于特定文化之中,其接受程式受制于整个阐释社群的文化释义压力。伴随文本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指认了文本的文化归属,也就对接受者的阐释方式提出了要求。

三、阐释社群的意义滑动

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受制于整个阐释社群的意义接受程式。将《孔乙己》视为小说而非自传,这里面固然有叙述形式的明显差别,同时也涉及阐释社群的意义压力。同理,将《阿Q正传》判定为鲁迅写的小说,而不是鲁迅真的要替阿Q立传,这里面卷入的仍旧是阐释问题,而阐释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与文本构建起的元语言作用。

《阿Q正传》的开头是“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19](P512)}。巧合的是,2010年《人民文学》首开非虚构奖,获奖作品有萧相国《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该书第一个主角为小Q,“小Q个子矮小,是我的老乡,同一个地区,16岁那年他背着蛇皮袋子只身来到深圳……”^{[25](P10)}两个人物都用Q这个字母指代,前者是小说虚构,后者是非虚构,此中差异自然依托于文本的形式差异,即叙述策略与伴随文本共同传递的真实感,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关联的元语言。

1. 从文本到文化: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语境元语言的合力

一方面,文本自携元语言来解释自身。“文本固然是解释的对象,但是文本以及伴随文本,也参与构筑解释自身所需要的元语言。”^{[21](P228-229)}这意味着,副文本与型文本向整个阐释社群标明了自己的类型,并要求读者按照相应的接受程式来阅读。文本类型的压力推动着解释的向度,例如新闻与电影,从视觉呈现上来看两者很容易混淆,911事件中袭击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事件与《碟中谍》中克里姆林宫爆炸,前者是历史真实,后者是电影虚构,区分两者最明确的标志就是文本自携元语言。前者以新闻播报的形式宣告文本为纪实型叙述,后者以电影片头等伴随文本的形式宣告该文本为虚构型叙述。当然,两者的叙述形式也存在差别,但是,文本类型所确定的解释框架与阐释社群的接受程式契合,限定阐释模式的同时也排除了误读可能。至于鲍德里亚在《海湾战争未曾发生》一文中声称“战争没有发生”,将战争视为媒体制造的虚假影像,也只是突出符号再现与原初事实的差别。当符号再现在场时,事实真相也就离场消失了,“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26](P8)}。这种影像取代事实的论断并没有动摇体裁规定的解释方式,而是指认符号“再现对象”永远无法“成为对象”,这仍旧是虚构泛化论的延续。

另一方面,文化设定语的语境元语言能够影响阐释。语境元语言处理的是文本与社会文化之间的

关系,即文化会判定文本的处理方式,塑造阐释社群对意义的认知框架。这意味着,时代变迁、文化更迭等都影响着语境元语言的形态。以小说为例,《汉书·艺文志》有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质疑小说的真实性,将其视作人为构造的故事。到了新文化运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借文体流变抬高白话小说的地位,“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27](P7-8)}。胡适意图开白话小说风气,指明小说是对社会情状的真实描写。小说的内涵、功能、文化地位不断变化,由此带来的是接受程式的流变。将其视为虚构之言,抑或将其当作真实描摹,当时的语境元语言都进行了类型划分,由此建构了相应的阐释要求。如今,传记、日记等被归为纪实型叙述,神话、科幻等被归为虚构型叙述,也是语境元语言奠定了不同的阐释方式。

元语言确立了文化对于文本的区隔框架,纪实和虚构都在区隔框架中对应接受程式。赵毅衡认为:“区隔框架是一个形态方式,是一种作者与读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也是随着文化变迁而变化的体裁规范模式。”^{[16](P74)}一度区隔是再现区隔,如游记作为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隔开一层,这是纪实型叙述,不管该叙述是否讲出真实,其都可以声称(也要求接受者认为)是在讲述真实;二度区隔是在一度区隔内再切出一个内层,建立一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这是虚构型叙述,并不要求其对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负责。如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作者阿来叙述自己的亲历考证处于一度区隔内,构成了文本主体的纪实框架,该书内部对于贡布郎加的语言、动作、心理描写处于二度区隔,呈现出明显的虚构叙述特征。由此可以判定,“‘非虚构文学’的文本特征,即文本能够在一度区隔和二度区隔之间滑动。‘非虚构文学’在一度区隔中纪实,在二度区隔内虚构,两者和谐共存”^{[28](P57)}。

2. 文本之外:作者与读者的合谋

意义滑动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外部层面是文化元语言的变迁导致阐释社群对文体理解的意义滑动,内部层面是文本构建的区隔框架促成了读者接受程式的意义滑动。前者是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语境元语言的合力作用,后者是作者与读者共同认可的形式的区隔作用,即“如何写”与“如何读”在文本形式的理解上达成了共识。

当然,区隔作用的实现需要读者的文化接受程式来推动。同一元语言背景下,读者对同一叙述形式的判定必然会存在差异。宇文所安指出:“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读者所共有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氛围和文学传统。”^{[29](P35)}推而广之,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学传统使得读者还共有一种文学阐释模式,即为整个阐释社群所共同认可的接受程式。但更为复杂的是,这套共有的阐释模式并不是均等地存在于社群每个成员的认知图式中。甚至读者可以有意识地搁置区隔框架,从虚构中解读真实,抑或刻意与纪实型叙述文本保持距离,将一切作为虚构来看,这里面就是读者的阅读策略问题。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要把“非虚构”置于不可知论,而是要澄清,学术圈所共享的阐释模式只是总体阐释的一个圈层。换言之,不同社群在总体文化共识下仍旧共享着不同的阐释模式。“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与“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30](P4)}都是“我”作为女性叙述的哀怨,如何判定虚构还是纪实取决于读者受到何种阐释模式的推动。

《国风·卫风·氓》被视为弃妇自述婚姻悲剧,而李金发的《弃妇》被视为虚构,这是一套文学阐释模式的接受结果。有关是否非虚构的讨论,也是在一种共享的文学阐释话语中的求同存异。文学、新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都各自建构了一套共享的阐释话语,对于非虚构的判定也有着来自学科叙述程式的压力。作者与读者基于文本形式投射的阐释模式做出判断,求真意图和理解真实只有在一个话语层面上达成“合谋”状态才能实现“非虚构”效应。

结 语

总结来看,非虚构文学的成立需要立足于四个条件: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一、副文本与型文本的合拍、

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语境元语言的合力、作者与读者的合谋。反之,一旦四个条件有一个不成立,非虚构也就被解构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意味着叙述者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代言人”,不对文本事实负责。副文本直接标示其为虚构,型文本也就确定其文类归属,只能被作为虚构型文本。文本自携元语言无法自证真实,语境元语言也就无法引导出纪实型文本的接受程式。作者按照非虚构形式构建文本,但读者始终与文本保持距离,不愿(阐释模式)或不能(阐释能力)相信作者书写的真实性,非虚构在个体层面也就最终失效了。

有关非虚构文学的研究,不应只看到作者层面的亲历与考证,也不能对于形式特征含糊其辞,更不能受缚于文本内部的细读。意图真实只是文本真实的一种主观要求,形式特征则是一种文化形态。确证非虚构,需要从形式研究进入文化研究,将非虚构的成立放置在文本的动态生成与文化的历时变迁中进行思考。如此,有关“非虚构”的种种疑团与论争,就可以在理论辨析与创作实践中找到平衡点。

[参考文献]

- [1]陈竞.文学的求真与行动:文学报专访李敬泽[N].文学报,2010-12-09.
- [2]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J].文艺研究,2013(5).
- [3]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4]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M].陈静,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5]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6]杨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阐释机制:从虚构到非虚构[J].扬子江评论,2014(5).
- [7]GRAFF G. 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 literary ideas in modern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8]邢军纪.试论当代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1).
- [9]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J].文学评论,2016(3).
- [10]赵毅衡.形式与内容:何为主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10(B01).
- [11]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 [12]J. 希利斯·米勒.J. 希利斯·米勒文集[M]//王逢振,周敏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13]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8(5).
- [14]冯骥才.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J].当代文坛,2019(2).
- [15]陈文斌.非虚构小说中的真实与虚构:一个符号叙述学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9).
- [16]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17]洪治纲.非虚构:如何张扬“真实”[J].文艺争鸣,2021(4).
- [1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 [19]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0]马原.虚构:马原文集:卷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 [2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2]梁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3]S.A.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M].高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24]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 [25]萧相国.词典:南方工业生活[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 [26]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M].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27]胡适.胡适文集·胡适文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8]陈文斌.双区隔理论解读“非虚构小说”的文本特征:以阿来《瞻对》为例[J].当代文坛,2016(3).
- [29]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M].陈小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30]李金发.李金发诗全编[M].陈厚诚,李伟江,陈晓霞,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王 健)